

頁	誤	正	頁	誤	正
82	蔑視	蔑視	242	相封性	相對性
89	校頒廬	校邠廬	243	政休	政體
96	兼該	兼該(賅)	250	與接爲構	與接爲遑
98	夏目瀨石	夏目漱石	255	劉春峰	劉青峰
106	楊廣先	楊光先	256	鄒雍	邵雍
110	有機機	有機體		无世運會	元會運世
132	論辨	論辯	259	楠本正成	楠本正繼
135	反感中醫	對中醫反感	268	賁荀	賁荀
154	阿樂卑斯山	阿爾卑斯山	297	荀緘	荀緘
167	追達/追俗	通達/通俗	304	物竟天擇	物競天擇
188	赫胥	赫胥黎	314	郭頤頤	郭穎頤
195	朱晤菴	朱晦菴	325	陸王心學	陸王心學
197	太易	太極	332	大觀院	大觀園
201	可神道	可是神道	340	贏得	贏得
219	施瓦茨	史華慈	341	此田大作	池田大作

王中江書頁81引水戶藩士會澤正志齋的話「朝氣、正氣是爲陽」與「暮氣、邪氣是爲陰」。他可能受老子影響，倡陽生、陰殺；或受董仲舒濡染，倡陽善、陰惡。嚴復晚年不再抨擊德國民族性，而激賞德國強人政治，且向法家哲學讓步，意味著肯定必需的陰惡（殺）。留學德國的宗白華，更爲敬畏德人強悍剛毅，遂闡揚德國美學。

□香港大學·王煜□

革命與立憲\*。潘英著。臺北，谷風出版社，1988年11月，235頁。

該書爲一書評集，收集了作者對環繞著清末民初「革命與立憲」一主題的四十五本書所做的評論，其中除了少數幾本西文的中譯本之外，① 其它均

\*本書承墨子刻教授 (Prof. Thomas Metzger) 推介，文成又蒙指正，謹此致謝。

① 中譯西書有史扶鄰，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 (Harold Schiffrin, *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薛君度，黃興與中國革命 (Chun-tu Hsüeh, *Huang Hs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以及李文蓀的梁啟超 (Joseph Levenson,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等書。

爲國人的作品，內容包括有關孫中山者十部，梁啟超者十一部，另外則是有關黃興、宋教仁、胡漢民、朱執信、康有爲、張謇等人的書；就出版年代來說，有些書是本世紀初葉的作品，有些則爲最近十、二十年在臺灣出版的著作；就性質而言，有些是歷史當事人的自述、史料集，有些則是詮釋性的史學著作。爲什麼作者會把這些書放在一起討論而不選擇其它的書？我覺得其中有一個理由可能是因爲在一九八〇年代，它們被放在臺北的幾間大書店中的同一個書櫃上。因此這些書也可以說代表了近年來在臺灣對此一主題所能聽到的主要聲音。作者有意將它們放在一個固定時間點上（1988？），讓它們彼此辯論，他並以一個統一的觀點對這些書學術貢獻的高下算一個總帳。

該書的特色是以書評集結成書的方式來表達作者對此一主題的觀點，這在臺灣史學界中是十分少見的，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個「異數」。在西方學術傳統中「書評」(book reviews) 以及「書評論文」(review articles) 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只要出版一本新書幾乎都會有好幾篇評論，而研究領域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則有書評論文作整體評估。以研究亞洲史的重要期刊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爲例，每一期幾乎有近一半的篇幅是書評與書評論文；而且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利用每季出版的《書評引得》(*Book Review Index*) 找到所有的評論，十分方便。而這又涉及西方學界強調累積學術成果與溝通辯論的觀念，凡立一說，大多會先評論已有的成就，再強調自己的看法與前人解釋的不同。總之，後人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每人不必從頭作起。可惜這一套學術規範在臺灣史學界還沒有受到完全的肯定。臺大黃俊傑教授曾說臺灣史學界像一個籃球場，場上有人赤腳，有人穿球鞋，有人穿皮鞋，還有人穿釘鞋，話雖有趣卻點出了一個相當可哀的現象。潘氏一書的出版在此學術背景下是很有意義的，我們很希望看到更多類似作品的出現，對已有的史學貢獻做進一步的反省與評估。

但遺憾的是此書仍有許多技術性的缺點，例如作者對每一本書只列出著作者、書名與出版社，而缺乏出版時間、地點、版本、頁數等其它資料，更沒有書目、索引等，再加上一些排版上的錯字，給人一種不够精細的感覺。當然這些「特色」可說是臺灣出版界所共有的缺點，並非全爲作者之過，然而如果作者與出版商能互相督促，就此力求改善，則造福讀者不淺。

上述這些技術性的缺點實際也反映了一個根本的觀念問題，由於忽略了出版時間，作者將過去近一世紀間所出版的書做一平面處理，使讀者完全看不到學術的演變與承襲。因此作者如能加上時間的面向，甚至分析地理或研

究羣體等因素的影響會使研究的主題變得更清楚。此外作者完全以臺灣書肆上所能找到的「一部分」的書當作評論對象，而不談外文或大陸的作品也顯得視野過於狹窄。當然此書並非一組織嚴謹的專著，如此批評過於嚴苛，但如能進一步完成一部如馬若孟 (Roman Myers)、墨子刻 (Thomas Metzger) 的書評論文或柯保安 (Paul A. Cohen) 的專書那樣檢討美國漢學界研究典範之演變的作品則是我們所樂見的事。<sup>②</sup>

作者忽略各書的時間面向其實是可以理解的，對他來說，大多數他所評論的書都被框在一個我稱之為「革命典範」的研究取向之內，而只有「極少數」的人能有打破這個正統觀念或政治神話而公允地研究這一段歷史。綜合作者的觀點，這一「革命典範」有以下幾個重點：

一、盲目崇拜孫中山，一切成就歸之於孫中山和他所領導的革命活動。

二、極端諱言革命陣營內黨派的分歧與人際的衝突。例如不重視興中會時孫中山與楊衢雲的分裂，同盟會時章炳麟與宋教仁對孫的非難；忽略光復會與華興會之角色等。

三、以為「革命」是好而「君憲」是壞，並抹殺或塗黑立憲派人士的貢獻。最好的例子是對1905至1908年左右《民報》與《新民叢報》的辯論，採取民報作者本身的評估，認為「民報全勝，梁棄甲曳兵」。

總之作者強烈質疑「民國史就是革命黨史」的觀點。指出應客觀研究孫中山以外的領袖、同盟會以外的黨派，尤其應肯定康有為、梁啟超以及後來進步黨人在歷史上的貢獻。這些觀點其實並不新穎，以中研院近史所為主的「南港學派」以及許多外國學者均以此取向治清末民初歷史。在作者所稱許或部分稱許的史家中史扶鄰與薛君度是國外學者，<sup>③</sup>而張朋園、張玉法、朱法源與呂芳上則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人員。但作者以書評的方式卻能以十分具體的例子指出這些觀念在臺灣學術界與教育界所曾具有的影響力。

② Roman Myers and Thomas Metzger, "Sinological Shadows: The State of Modern Chin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3(2): 87-114. (此文在《食貨雜誌》上有中文翻譯) Roman Myers, "How Did the Modern Chinese Economy Develop? A Review Articl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0:3 (1991), 604-628. Paul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③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外國學者之中潘氏贊許史扶鄰而貶抑李文葆；然而在國外，許多學者却對李文葆有很高的評價，許之為莫札特式天才人物。

以這種反「革命典範」的標準來評量，作者多次討論到近史所出版的專刊或同仁的作品，他以爲元冰峰的《清末革命與君憲之論爭》以論爭之中革命黨大獲全勝，「是革命宣傳品」（頁231）；而朱滋源《同盟會的革命理論》以同盟會在排滿情緒上適合當時年輕人的胃口，但在政治、社會理論上落後「是當時的真像」（頁24）。作者又以爲張朋園先生的《梁啟超與清季革命》肯定梁氏貢獻，是「一部難得一見的好書」，但他對張氏將梁指爲本質是革命黨人，則以爲是「受某種意識型態左右」（頁163）；對張氏《立憲派與辛亥革命》深入探討立憲派之角色，作者十分稱讚，以爲該書是具有空前貢獻的好書（頁219）。此外對張玉法先生所著《清季的立憲團體》與《清季的革命團體》也是讚賞有加，認爲張先生能注意到主流以外的人際衝突與黨派競爭，「粉碎許多革命神話」，是一個「真正的學者」（頁121、123）。這些評估都反映作者反對以國民黨主流派爲中心的民國史觀。

作者以書評的型式主張打倒偉人神話、掙脫意識型態的束縛、要求「還給歷史真像」等不僅只具有史學上的意義，其本身更代表了一種「解嚴後的心態」。我認爲此書與大學校園內批判理論、解構主義的盛行，小劇場等後現代主義的表演藝術以及激昂的政治反對運動等現象屬於同一「思想的氣候」（climates of opinion），<sup>④</sup>代表了解嚴之後在不同層面上「邊陲」對「核心」的反撲。就此而言這一本在1988年，也是解嚴後一年所出版的書評集實際上本身也參與了另一個時代的會話，由此可見史學研究與現實社會之間的緊密關連。

作者的另一貢獻是一些比較零散的史學上的論斷，這顯然是由於作者對這一段史事的高度熟稔，因此往往能見人之所未見，這些小地方實應細心體會。以他對梁啟超的思想之意見爲例，他認爲雖然表面上梁氏自稱思想「流質易變」，實際終其一生有一貫的基本信念，此一信念是和平改革，但不排斥激烈的革命手段。以此觀點來看梁氏思想的發展，他認爲梁氏在1903年以後趨於保守固然與其美國旅行的經驗有關，但是主要是因爲有兩個潛在的因素：

梁氏心中若沒有其他潛在因素，遊一趟美洲，縱然有所見、有所聞，言論應該也不可能發生如此大的改變，……我們以爲梁氏言論轉變的潛在因素有二：其一，梁基本上是一爲君憲及和平改革主張者，革命

<sup>④</sup> 這是 Carl Becker 的用語，見氏著 *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1-31.

只是他不得已而行之的「最險之著」與「最下之策」。其二，自立軍之役的失敗雖促使他走上革命之路，但革命的動亂卻又為他所目睹，心理上無疑已蒙上一層陰影；等到某一情況出現，使他感覺這一「最險之著」確實危險，這一「最下之策」確實最下，這一陰影無疑地又促使他回到他原來的主張。（頁183）

作者上述的論斷雖嫌籠統卻很有見地，同時他更進一步肯定蕭公權在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序所言，梁啟超與孫中山不能合作原因雖多，但思想的歧異是很重要的一點。這些論斷都是了解梁氏思想的關節，而與本人最近對梁氏《新民說》之分析不謀而合。事實上根據拙文，梁氏在赴美之前所撰《新民說》中已有保守傾向，強調人性的幽闇面、政黨政治是小人的競爭、惡法亦法，反對社會福利政策與不切實際的全面更新等，美國之行只是進一步強化他原有的看法而已；同時這些植根於梁氏思想中的保守與調適的觀念與孫中山的思想格格不入，這種基本信念上的衝突是不容忽略的。

整體來說，此書雖有瑕疵，但能自圓其說，且有獨特見解，可讀性很高，惟間或有些過度情緒性的字眼，有失史學上敦厚平和之旨，似宜避免。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黃克武□

**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 謝國興著，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八十年。

區域——尤其是內陸省區的現代化歷程，是目前大陸與臺灣史學界共同關注的課題。謝國興先生近著《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以下簡稱《安徽》）的問世，無疑為這個熱門課題增添了一部渾厚精彩的力作。

《安徽》一書在架構上雖然與該所「區域研究」的其他著作類似，但仍儘可能地突顯安徽地區在追求現代化過程中所展現的重要風貌。所謂近代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作者將其化約為「致富求強，追求平等自由的過程」（2頁），亦即近代中國「發展與變遷」的主要形貌（3頁）。本書除前言與結論外，共分五章，每章各有小結，均係環繞「發展與變遷」立論。

在第一章《背景分析》中，作者以為，傳統安徽的產業結構仍停留在小農經濟生產的階段，工商活動只能維持小區域內自給經濟之格局，產業結構繼以自發的產生根本性革命（75頁）。並且由於賦稅用度、政府功能、自然